

西和文史资料

(此材料供参考)

第三十一期

政协西和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



任尚蕙生平与著述钩沉

赵建夫

任进士是西和妇孺皆知的人物，民间歇后语中都说到他。然而，关于他的事迹，缺乏较为详细的记载。《西和文史资料》第二十四期有廖士先先生与常志强同志合写之《任尚蕙生平小考》，已对一些问题加以考索，表彰前贤，其情可感；今撰为一文，以为续貂，并以答编者约稿之雅意。

一、任氏字、号辨正

任进士名尚蕙，《小考》中作“尚慧”，系打印之误。

朱琴伯（綉梓）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编成之《西和县志》卷九《群材》有任尚蕙传，共约一百六十来字。其前半说，

任尚蕙，字震山，县东青土坡人。乾隆丁未进士。授兵部武库清吏司主事。辞归，主讲兰州书院，继又主讲秦州书院。

既老还里，遨游山水，以诗歌自娱。

此言任氏“字震山”。廖、常二位之《小考》云：“字震山，号兰台”。依我所见，任氏应是字兰台，号震山。理由有四：

一、《白虎通义》中说：“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这是说，古人取字，其义或与名相近，或与名相关，或与名相反，总之两两相应，不会毫无关系。这也正是黄侃所谓：“名虽有五，字则要曰自证其名之道”（《春秋名字解诂补遗》）。唐宋以后不太讲究这一点，但一些读书人仍然顺从古俗，取字须求其证名。“震山”与“尚蕙”无论字义、事类，均无关系，则“震山”非字，可以初步肯定。

二、任氏《常太孺人九十有一寿序》及《王兑山先生教泽碑记》（俱见朱编《西和县志》）署名中均出“兰台”二字，则“兰台”非字即号，非号即字。

按，“兰台”本战国时楚台名（见《昭明文选·风赋》；《史记·楚世家》）。西汉之初虽然政治上承袭秦制，但文化上多从楚俗。汉代言廷筑台藏书（取其干燥、通风和机密，上古所谓“台”亦上有阁室），即名曰“兰台”。则任氏取“兰台”二字，着眼于研读史册，讲学论道之义。

古人往往将“兰”与“蕙”相提并论，并用来比喻贤才或美德。屈原《离骚》云，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屈原正是用“滋兰”、“树蕙”来比喻自己的培育贤才。

追溯西汉时称宫廷藏书之处为“兰台”的根源，应与楚人以“兰”“蕙”喻贤才、美德的风气有关。所以“兰台”与“蕙”，意义是相关的。所谓“尚蕙”，也正是尊崇人才的意思，而尊崇人才、培育人才与讲学论道，也本是一回事。

三、《王兑山先生教泽碑记》署名为：邑 进士任尚蕙兰台

按：古人署名，都是将字接在名之下，没有将号接在名之下的。如清代甘肃诗人张晋诗集《戒庵诗草》刻本，每卷开头都有“临洮张晋康侯著”。“焦获孙枝蔚约人评”，名下并不接“戒庵”二字。由任氏此文署名看，“兰台”为任氏之字无疑。

四、“兰台”为字，如上所述，那么以“震山”为号之假设，是否可以成立？按：《王兑山先生教泽碑记》中说：“我友王元德，字闻升，号兑山先生者……”则任氏好友王元德号“兑山”。如任氏所言，王元德“详究濂洛关闽之学，为文洒洒千言，操纸笔立就，而清越昌明，戛然独步”。“游其门者无论兰台、水南，济济多英俊之士，所谓学问根柢，师友渊源，真有大过人者”。任氏又为之作《教泽碑记》，可见二人关系甚厚，互为知音。“震”、“兑”都是卦名，震为雷，兑为泽。二人一号“震山”，一号“兑山”，应有双峰并峙之意。《易·象传·兑第五十八》：“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丽”通于“偏”，即“两”的意思。兑卦的卦象(☱)是上兑下兑，两泽相重，两泽相连则水交流，所以有两友交流学问的意思。王元德号“兑山”，应取义于此。

至于任氏号“震山”，应是取义于谨慎修省。《易·象传·震篇五十一》：“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因为震卦卦象(☳)是二雷相重，君子闻雷而惊惧，修德省身，以免天威震怒，给以惩罚。

考“兑山”本嵯峨山别名，山乃西汉水发源地，在今天水市西南，不在西和境内，所以我认为王元德不是从地望、籍贯方面着眼取号，而是另有寓意。先父子贤公曾说任氏长于《周易》，故我从《周易》方面对任、王二氏取号之义加以剖解阐释，很明显，王氏之号“兑山”同任氏之号“震山”应有关系，故由王氏之号，可以推知“震山”系任氏之号，而非任氏之字。

附带说一下：兑山虽远在西和之外、天水之境，但毕竟实有其山。不知陇南是否亦有山别名“震山”？这倒为研究陇南历史地理者提出了一个考察的线索。

由以上四点可以肯定，任尚蕙字兰台，号震山，以“震山”为任氏之字，起自朱编《西和县志》。廖、常二位以朱老夫子已言“震山”为字，故定“兰台”为号。

二、家世与生年

任尚蕙祖父名任辉先，字承斋。乾隆三十九年编《西和县志》上说：

任辉先，字承斋，天性肫挚，操行纯洁，急公奉上，邑长吏尝信重之，隐居不仕，惟以训课子孙为务。今甲午乡试，孙尚蕙登贤书，皆德门余庆所致也。年逾八十而歿。

此《传》在卷三《乡贤》之中。由此来看，任尚蕙的祖父也是一个读书人，在地方上有些声望。

乾隆本《西和县志》任尚蕙为主要修纂人，他列其祖于乡贤，而未及其父一字，似其父非斯文中人；他致力仕途，是受乃祖影响。

关于任尚蕙的生卒年，朱编《县志》未言之。《教泽碑记》中说：“余年五十有五，游庠序登甲子乡榜”。据此推算，应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亦即公元一七二〇年）。《小考》一文已言之。那么，任氏中举之时已五十五岁，中进士时已六十八岁。

由于明清八股取士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思想的禁锢和毒害，当时常有些人老态龙钟，扶杖应试。即以任尚蕙获捷之丁未春闱而论，八十岁以上应试而就有四十四人（皆未中）。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八载，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丁未（初十）弘历谕：

据知贡举蓝应元奏，本年会试举子内，九十岁以上者七名，八十岁以上者三十七名，皆三场完竣，揭晓后未经中式等语。此次各省举子，年老应试者多至五十余人，俱庞眉皓首，踊跃观光，允为升平人瑞。

于是，“年届九十九岁之李宏道，著加恩赏给翰林院编修衔”，其八

十九岁以上之四十人，“俱著赏给翰林院检讨衔”。七十岁以上的“俱著赏给国子监学正衔”。还有些是前次大选已获“恩赏”，又出来点缀升平的，也都照例以教职銓补。根据这个情况看，任尚蕙于六十八岁才中进士，应为可能之事。

但《小考》一文还留有一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解决。

《小考》中言：“其宗族中保存有任氏官阶大红纱灯一对，銜亦为丁未科进士，兵部武库主事”。“任氏的另一个纱灯上书“进士外翰第，岁次癸巳年”。任氏是乾隆甲午中举的，如《小考》所言，乾隆癸巳时不可能会有此灯，此灯应制于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即一八八三年）。《小考》推猜“此灯属御赐的可能性大”。按：任氏终其身作为兵部武库清吏司主事，官阶正六品，又并无殊勋，因而皇帝也不可能在他死去三十年后又给家中赏赐灯具以示缅怀。况且至道光时朝中已换过两朝天子，时过境迁，除元勋之家，是不会受到这种恩宠的。我又将《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九至卷二百四十七（道光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翻阅一过，其中并无赐臣下灯具之事，也未见任氏的名字。

如果任氏直活至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则已一百一十四岁。然而《小考》云：“卒年无确凿记载，或谓享寿八十有四，或谓八十。”则两相矛盾。我怀疑纱灯上的字可能是“癸丑”（一七九三年）或“癸亥”（一八〇三年），因年久字迹不清或破损而

被误认，曾先后投书廖士先先生与常志强同志询问其详。常志强同志言纱灯尚在，字迹清晰可辨。这样，就有两种可能：

一、任氏确实活到了道光癸巳年。

二、上有“岁次癸巳”四字之纱灯为任氏死后家中所作或重糊。

关于这个疑案的解决，有待于关于任氏之新材料之发现。因为有些实物未能亲自过目，有的材料也因自己远在兰州而不能翻阅（如朱编《西和县志》的《艺文》等部分），故只能作如上的推论。

但无论怎样，任氏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可以肯定。这个结论除了《教泽碑记》提供的“年五十五登甲午乡榜”一条证据之外，还可以从其他几个方面得到一些旁证。

首先，《教泽碑记》同时还说到他是在乾隆己巳（乾隆十四年）考为秀才（详下《科举与交游》部分），这样，就为我们确定了一个任氏生年的大体下限。

其次，任氏赴西安乡试之前当时的西和县儒学训导陈其忠有两首五言律诗赠他，诗中有“执艺沈居肆”，“力深曾透铁”的话。这话如用于较年轻的应举秀才，近于阿谀，而如理解为对一个五十余岁尚身着青领的人的解嘲语，则最为切合。“执艺居肆”的典故见于《楚辞·天问》：“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王逸注，“师望，谓太公也。昌，乃文王名也。言太公在肆市而屠，文王何以识之乎？”“后，谓文王也。言吕望鼓刀在列肆，文王亲往问之。对曰：

‘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文王喜，载与俱归也”。“艺”指学问、能力。“执艺犹居肆”是说象姜太公一样虽有治国安邦的能力，却还没有作上官。姜太公的发迹是在年老之后（《史记·齐太公世家》：“姜尚盖尝贫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奸”为“干”之借字）。从这个典故的蕴意上来分析，也以应举时年已在五十以上为近理。此外，“何斯累北情”一句似乎也透露了同上边所说相同的意思。

第三，朱编《县志》上说任氏被授职后“辞归，主讲兰州书院，继又主讲秦州书院”。一般情况，新中进士刚授职，没有辞归的。只有年龄过大的，主要图一个名声，因而得到虚衔，并不就职，或者即使就职，也不过应景罢了，并无较长久的打算。任氏自己说：“余既乞假，旋归。岁初曾欲北上供职，缘囊空未决，近仅伏谕席于秦州天水书院”。这只能看作是故作姿态，自我解嘲。实际上的原因，是任氏已七十一岁，以此高龄，不但难于在数千里之外供职，且亦不胜路途颠顿之苦。

第四，任氏一生没有留下多少著作，中进士之后的一段时间，履历也十分简单。朱编《县志》说，任氏在秦州教书之后，“既老还乡，遨游山水，以诗歌自娱”。但并不见他有诗歌传下来，文也没有多少。这除却他本人的学力、志趣之外，恐亦同辞归后大约经过了十多年硬死去有关。

关于任氏的卒年，《小考》引述了两种传说：一为八十四岁，一

为八十岁。我以为八十四岁的可能性大。“八十岁”不过是传说中对“八十多岁”的大略的说法，举其成数而已，“八十四岁”应是确切的传说。如果此说成立，则任氏应卒于嘉庆癸亥（嘉庆八年，公元一八〇三年）。当然，任氏卒年的最后确定，还有待于新的材料的发现。

三、科举与交游

任尚蕙一生当中的三个重要事件，便是中秀才、中举、中进士。现依次考述如下。

任尚蕙中秀才是在乾隆己巳（乾隆十四年，即公元一七四九年）。《王兑山先生教泽碑记》中说到王元德的大哥王元贵时说：

长曰元贵，字锡山，醇茂温恭，允为超异。乾隆己巳岁
与余同年为博士弟子员。

清代亦称秀才为“博士弟子员”。可见任氏去巩昌府应秀才试，同行并且获捷者尚有王元贵。时任氏三十岁。

此后二十五年，共经九次乡试，大抵任氏也有未去应考的情况。

乾隆三十九年，任氏五十五岁。此年秋天又被荐往西安参加乡试。行前儒学训导陈其忠有两首诗，见于乾隆本《西和县志》卷四。今录之如下：

甲午秋间任生得荐漫书二律

勛同学诸子

三秋丹桂发，莫但一人攀。拔艺犹居肆，安禅尚闭关。

功深曾透铁，至味非特为（按“为”字有误）。功冀勤磨砺，
书升咫尺间。

其 二

筒编函至味，非特为功名。但作图南计，何惭累北情。

锦标辉凤藻，金石琢鸿声。道妙因文见，超腾世所荣。

诗中第一首的前两句是用了“月中折桂”之典，意谓任氏此去必然高中，希望他带动诸子，共步蟾宫。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二首第二联。

但作图南计，何惭累北情。

其中“图南计”是用了《庄子·逍遥游》大鹏背负青天，徙往南海的典故，意思是任氏只须努力于万里鹏程，其他不必过多考虑。“北”是“败北”之义，“累北”即累次文战不利。由“何惭累北情”一句看，任氏在乾隆甲午之前已多次应考过。

乾隆甲午陕西乡试正主考官稽承谦，字受之，江南无锡人，辛巳进士，时任翰林院编修。任氏在《教泽碑记》中谈到王元德之弟王元佐说，

季元佐，丁酉选贡，侯詮教谕，与余同出陕甘督学稽老

师门下。

这所谓“稽老师”，即指稽承谦。甲午陕西乡试副主考官姚梁，字甸之，浙江庆元人，己丑进士，时任宗人府主事。

此次乡试的考题是：“樊迟问仁”一节（按：此《论语·颜渊》之第二十二章）。“诗曰衣锦”一句（按：此《中庸》中句子，原文：“《诗》曰：衣锦尚絺，恶其文之著也”）。“乡人 长于乡人”（按：此为《孟子·告子上》中句子，原文为：“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赋得“白露为霜”（按：此《诗经·秦风·蒹葭》中一句），得“晞”字。

这次陕西乡试所得解元为张释武，宁夏人（以上并据清代法式善《清秘述闻》卷三）。

甲午乡试获捷，任氏算是在科举的道路上跨过了第二道门槛。此后直至乾隆丁未中进士，中隔一十三载，应有五次会试。任氏很可能是每期必至。他在《常太孺人九十有一寿序》中说：

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秦、晋、冀、豫数州，足迹几遍，见见闻闻，亦云甚夥。

《王兑山先生敦泽碑记》中也说：

数十年间，足迹几遍宇内，所遇自村里乡党，及大邑通

都，凡硕彦鉅儒，因为所在多有……

看来他自己对于走过很多地方印象很深，也极为自负，凡作文必要称述一番。崆峒自在甘肃，“秦”也是乡试时就经过的，但“晋、冀、豫”数州以及“北过涿鹿”，“足迹几遍海内”，则分明都是指上京参加会试的经历而言。《寿序》作于乾隆四十五年，由此至少可以肯

定。任氏在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以前已上京应考过一两次了。

任尚意于乾隆五十二年参加丁未科会试。清代从乾隆十一年起，会试在三月举行。此年会试正主考官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辛巳进士。时任内阁大学士。副主考官二人：姜晟，字光宇，江南元和人，丙戌进士。时任刑部侍郎；瑞保，字执桓，满洲镶黄旗人，乙未进士。时为内阁学士。

考题“子路问之”二句，“故君子尊”三句，“孟子曰道”全章。赋得“四时为柄”，得“乾”字。

所取会元顾钰，字式度，江南无锡人（以上据《清秘述闻》卷八）。

殿试是在四月戊午（二十一日）举行的。《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九记载。此日“策试天下贡士顾钰等一百三十七人于太和殿前”。皇帝赐给了一篇很长的“圣训”之词。同日降旨：

以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稽颡，内阁学士阿肅、胡高望，

吏部尚书刘世明，礼部尚书纪昀，兵部尚书彭元瑞，左都御史

李绶为殿试阅卷官。

这些人中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是纪昀。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自号石公，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文笔简洁，含意隽永，为人所共知。阿桂、阿肅为满人。

四月壬戌（二十五日）传胪。“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史致光、

孙星衍、董教增三人进士及第，二甲朱理等四十五人进士出身，三甲焦以厚等八十九人同进士出身”（见同前）。任尚蕙为三甲第七十五名（《明清进士题名碑录》）。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记载，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辛未（五日）

内阁、翰林院带领新进士引见，得旨：

新科进士一甲三名史致光、孙星衍、董教增业经授职（按：同月庚午授史致光为翰林院修撰，孙星衍、董教增为翰林院编修）；

朱理、王观、李如筠、秦恩复、马履泰、何道冲、范逢恩、龙廷槐、谢恭铭、李传熊、任銜蕙、何泌、柳迈祖、胡钰、王祖武、陈士雅、汪彦博、初乔龄、吴烜、顾钰、潘绍经、杜南棠、陈若霖、张博、翁树培、瑚图礼、尹英图、周维坛、赵继昌，俱著改为翰林院庶吉士；

汤藩、彭希洛、马书欣、方建钟、邱焘、谈祖绶、周维祺、吴煦、郭均、邱先德、何道生、李承端、陆元铨、雷希霖、周廷森、潘鹭、焦以厚、施履亨、周鐸、高乐生、刘广恕、包恺、薛其、毛登瀛、钱豫章、章守勋、王国元、沈叔埏、徐森、王肇成、任澍南、贾拔、马维驭、张祥云、茅豫、郑文明、瑚图灵阿、杨维翊、杨彦青、漆奎、际良、杨梦符、

任尚蕙、马潜蛟、宋鸣琦、胡永涣，俱著分部学习；

吴于宣、康纶俊、唐仁植、龚鹤鸣、叶中鲤、蔡振中、
刘德懋，俱著以知县即用。

余者归班全选。

根据任氏在《王兑山先生教泽碑记》中自述及宗族所保存的职衔纱灯等分析，任氏当时被分在兵部，由吏部直接任为兵部武库清吏司主事。《清高宗实录》自此后直至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五十余卷中再不见有任尚蕙名字。据《教泽碑记》，他在五十五年春天曾有过“北上供职”的打算，曾主讲于兰州某书院，则当时回到甘肃至少已有一年多时间。

清代官场及通过科举踏入社会的知识分子很重视师生之谊及同年关系，我因而将任氏参加乡、会试的正副主考官及会试的同年一并列出，为探索任氏交游等问题提供一点线索。

老师方面的交往，已经知道的是王杰为任氏写过一幅“进士第”的匾额。纪昀的《纪文达公文集》十六卷中无关于任尚蕙的文字。

任氏的同年中，此后成就最高的是孙星衍，孙星衍字伯渊，江苏阳湖人，始授翰林院编修，后改刑部主事，历官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引疾归乡以后，历主讲经精舍、钟山书院。他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金石萃编》以及与甘肃学者邢澍合编之《寰宇方碑录》等著作，在学术界一直受到重视。他的学术著作有数十种，又有诗文集二十五卷。袁枚品其诗为“天下奇才”。孙氏的《芳茂山

《文集》十二卷，《芳茂山人诗录》九卷及《租船咏史集》中，均未提及任尚意。

任尚意赴京参加会试之时，阶州邢澍也在北京。邢澍字雨民，一字自轩，号佳山，生于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四十四年考中举人，此后在阶州（今武都县）龙山攻读一、二年，然后赴京。乾隆五十一年曾在诗人和亮家中作塾师，乾隆五十五年中进士，时年三十二岁。从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在浙江、江西作官，期间只嘉庆十三年回阶州一次，十四年又离开。因邢澍著作，文稿多毁于乱兵，其与任尚意是否有过交往，亦无从考证。邢澍一生著述宏富，天水冯国瑞有《邢佳山先生著述考》，列有《十三经释天》等十五种。今所知有刊本的只《关右经籍考》、《金石文字辨异》、《长兴县志》及与孙星衍合著之《寰宇访碑录》；冯国瑞辑其《南旋诗草》与《守雅堂文集》为《守雅堂稿辑存》刊行。《南旋诗草》与《守雅堂文集》中皆未见提到任尚意。

甘肃与任尚意大体同时的学者还有吴镇、胡秋、张翊、杨于果。

吴镇生于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死于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字信辰，一字士安，号松厓，别号松花道人。狄道（今临洮）人。乾隆六年拔贡，曾先后在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任知县、知州之职，后告归，主讲兰山书院。著有《松花庵诗草》、《松花庵游草》、《松花庵逸草》、《兰山诗草》、《松花庵文稿》等。其诗文中无

关于任氏的文字。

胡伏，字静庵，秦安人，与吴镇同学于牛运震，贡生，官至东台训导。其诗文集未见。所纂《直隶秦州新志》为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张翔，字凤扬，号桐圃，武威人，约生于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乾隆三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此后先后在江西、湖北、贵州、湖南等省任知府。著有《念初堂诗集》四卷。其中无关于任尚蕙之诗。

杨于果，字硕亭，秦安人，师事胡伏，乾隆四十年进士。后在湖北长阳等地任知县等近三十年。著述有《审岩诗文集》、《群经析疑》、《二十一史史概》及《史汉笺记》。其《审岩诗文集》西北师院无藏书，省图书馆又在准备搬迁，也不能查阅，不知其中是否有关于任尚蕙的文字。

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任氏当时在外边毫无影响。这自然同他一生的经历、事业、志趣有关。

四、行 事

任尚蕙作为西和整个明清时代唯一的一名进士，在西和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从上面的考述可以看出，任氏本人是把科举看作一生的最大事业的。我们的看法应稍有不同。我们在肯定他在地方科举史上的地位的同时，还应主要看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事，一是著述。

现在我们先谈第一方面。

据朱编《西和县志》。任氏辞归以后，“主讲兰州书院，继又主讲秦州书院”。按：朱先生所列两书院名似有误。兰州在清代乾隆年间的书院名“兰山书院”。“兰州书院”或系泛指。又，“秦州书院”据《敦泽碑记》，应为“秦州天水书院”。“秦州”指所在之地，“天水书院”乃书院名。

任氏是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中进士的。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已“伏谕席于秦州天水书院”。而且，他是先主讲于兰州之书院，继主讲于秦州之天水书院的。从《敦泽碑记》“近仅伏谕席于秦州天水书院”之“近”字看，任氏到天水书院是乾隆五十五年春节以后的事。乾隆五十四年当是在兰州，年前归家，春节后方有“欲北上供职”之想，“缘囊空未决”，故就近在秦州设帐。

又，任氏中进士后，至五十二年五月被任职。任职之后，自然还要拜上级、拜同事、拜同乡、同年，扬眉吐气，走马观花。大约在此年年底或下年年初方乞假而归。归家后，不可能立即去兰州，因而，在兰州之书院大约也不过一年的样子。

在两地书院与任氏一起夺席谈经及亲沾任氏教泽的究竟有哪些人，今难以考知。

朱编《县志》说，任氏“继老归里，遨游山水”。可见在家乡过了若干年后方逝世。那么，任氏在秦州最多超不过七、八年。如以任